

苏联从政环境的历史考察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启示

吴春艳

(天津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4)

摘要: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中从政环境的演变是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苏共执政期间, 体制机制僵化, 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贪污腐败、奢靡享乐等问题严重, 污染了从政环境, 直接导致领导干部思想混乱、行为失范, 腐败问题连发。污浊的从政环境使苏共逐渐丧失了民心, 最终导致亡党亡国。对制度上和苏联有着传承关系的中国而言, 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 从政环境; 苏联解体; 思想僵化; 贪污腐败; 教条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5)05-0008-04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03

A Historical Review of Soviet Union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U Chun-yan

(College of Marx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dissolution was caused by many factors, of which pollut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During the rule of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dministration was too rigid; the problems of formalism, dogmatism, corruption and extravagant pleasures polluted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causing the ideological confusion,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bursts of leading cadres. Because of the pollut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Soviet Communist party lost the affe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resulting in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So, for China, which has introduc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Soviet Union, creating a bett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national long-term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Key Words: political environment; Soviet Union dissolution; rigid thinking; corruption; dogmatism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联国旗黯然降落,俄罗斯的三色旗在天空中徐徐升起。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政党,一个拥有两千多万名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无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轰然解体。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给苏联人民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灾难,学者们力图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不同的角度揭示苏联亡党亡国的真正原因,以警示后人。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提出从政环境的概念,认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慎海雄以从政主体为核心提出,从政环境是从政

的动机、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匹配的风气及舆论评价的总和,是廉洁从政的整体环境^[1]。时过境迁,重新审视苏联的那段历史,发现苏共亡党亡国同其从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联建国之初,从政环境清正、廉洁,领导干部能够严以律己、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的支持率很高;执政后期,从政环境混乱,党员干部贪污腐败,严重脱离群众,最后被人民抛弃。

一、苏联从政环境的历史考察

苏联从政环境的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到干部腐败、政府低效、政治混乱的过渡。梳理苏联史料可以发现,苏共从政环境中存在着诸多问

收稿日期: 2015-08-24

作者简介: 吴春艳(1983-),女,河北沧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研究。

题,而苏共领导却浑然不觉,依然在克里姆林宫过着高枕无忧的日子。从政环境的恶化使苏共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民心,最终失去了执政的根基。

第一,从政为利、不为民的思想泛滥。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员队伍比较纯洁,能够很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然而,这种良好的从政环境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就戛然而止了。由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党员干部的精神支点开始坍塌,党的权威开始动摇。甚至一些党员在舆论的漩涡中迷失了政治方向,渐渐忘记了从政为民的初衷,无政府主义思潮显露端倪。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随着特需、特供范围的扩大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实施,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逐渐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特殊阶层,即“官僚特权阶层”。这些人根据级别的不同,可以享受到免费就餐、豪华别墅、度假疗养等特权。甚至在以标榜民主著称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特供政策不但没有取消,涉及范围反而在不断加大。例如,特权阶层不仅能够以成本的1/22买到绿色有机的土豆和黄瓜,而且能够以低于成本费用一半的价格定做衣服。生长在国家温室的保护之中,官僚特权阶层变得保守僵化、不思进取、贪图享乐。这些消极的思想散播到党内其他组织之中,对党员干部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使苏共部分人的思想发生了蜕变。苏联共产党虽然有着庞大的党员数量,但是其中真正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甘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之人日益减少,以至于到苏共后期,党内民主遭到破坏而流于形式,个人专断、一言堂等现象严重,“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2]。这时期,通过所谓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口头上代表人民,而行动上却干着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党员入党动机变得复杂,他们不是为了信仰入党,而是看到苏共执政地位和党员身份对自己的前途有益处才申请入党。这些人入党以后,看到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就不再严以律己,甚至代之以欺压百姓、贪污腐败,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寻租受贿、走私贩私等腐败案件在苏共党内频频发生,涉及不同行业与部门,牵扯的领导干部人数众多。例如,苏共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件,就有来自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不同部门300多名党员干部参与其中,使国家蒙受了高达几百万卢布的经济损失。上世纪80年代末民主纲领派的代表人物波波夫曾经毫无避讳地宣称“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党政领导干部思想的异化为苏共从政环境增加了诸多消极因素,苏联社会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和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的良好风气丧失殆尽。

第二,从政思想僵化,教条主义问题严重。苏共执政中后期,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稳定,党内外出现了一种盲目乐观的形势。高层领导人骄傲自满,错误地将维持现状当做保持

稳定的主要方法。虽然苏共执政期间也曾探索政治、经济改革,但思想上的僵化和实践中的教条使其慢慢失去了先进性,逐渐与时代的列车脱轨。斯大林去世之后,马林科夫曾采取措施尝试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纠正片面发展重工业的格局,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然而赫鲁晓夫却教条主义地批判了这一改革,并视其为“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一条金科玉律被历届领导人延续下来,结果造成国家和社会畸形发展,人民所急需的生活用品供应短缺,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教条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主旋律。苏联国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在悄然改变。经济基础的改变要求苏共必须在客观上通过改革管理体制、改良分配制度、调整产业结构来完善上层建筑,然而,苏共领导集团并没有觉察到世界局势和国内局势的新变化,他们仍然采用旧的社会主义观来审视党内外。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由于领导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实际相结合,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上认识僵化,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损害了党群和干群关系。此外,由于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实施,党政干部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198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严重老化,平均年龄高达70.1岁、62.5岁、67岁和68.1岁^[3]。领导干部的老龄化使苏共逐渐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思想上被“守旧”和“惰性”所占据,行动上照本宣科、机械应付,喜欢刻板地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机械地执行领导指示,甚至连文件报告都以固定的形式出现。思想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盛行使党政干部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苏共党风日益衰退。

第三,干部选拔任用中唯亲不唯贤成为常态。培养和选拔优秀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核心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共党内实行定期的干部选举制度。为了避免选举流于形式,列宁强调党员有权了解党的干部,“了解他们的全部活动,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他们的成功和失败”^[4],通过对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道德品质三个方面的考察,选拔任用干部。斯大林执政之后为了巩固政治地位和培植亲信力量,创立了“官职等级名册制度”。名册上的干部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和审查,解除职务也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官职等级名册制度”的实施使选举制度流于形式,逐渐被实际上的任命制所取代。这种任命制使上下级之间以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存在,下级变成了上级的附属品,“唯上不唯下”的思想成为主导。失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由

人民的“儿子”变成了人民的“父母官”，手里的权力变成了谋利的工具。前苏联著名学者巴普洛维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场上的这种弊病，领导干部的升迁“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

上级领导通常依据自身的好恶和与自己关系的亲疏提名并任用候选人，导致从政环境中任人唯亲和拉帮结派现象泛滥。拉希多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央书记期间，在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大量安排其亲信，仅在乌共中央机关中的亲属就达 14 人之多。艾奥塞斯库任罗马尼亚总书记后，仅 1982 年一年就将反对他的 350 名高级领导干部全部解除职务，同时将 20 多名家族成员安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为了扩充政治势力，借改革之名撤换了大批党政干部，任命了一批支持自己的人。他的干部选用标准并不在于这些人政绩如何，而主要在于他们对自己是否忠诚。这种权力分配过程中的非正常现象直接导致苏共从政环境中的乱象丛生。一方面，党员干部为了获得升迁不得不投领导所好，通过贿赂、逢迎等方式表示忠心，以此获得支持和认同；另一方面，上级领导利用手中掌握的干部任免权力大搞政治寻租，通过培植亲信结党营私、打压政治对手。苏共执政期间，由于党内不同派别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利益冲突，派系斗争不停地上演；而在同一派系内部，成员之间为了维护个人或集团利益，经常互相袒护、朋比为奸，腐败窝案频频发生。党政干部的“近亲繁殖”，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苏联社会中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和破坏力。

二、苏联从政环境的特点

第一，上行下效，高层腐败与中下层腐败共生。“上枉下曲，上乱下逆”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苏联共产党从政环境中的乱象。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现象不仅凸显在中下层领导干部的工作中，而且在苏共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工作中亦有显现。斯大林作为苏共的杰出领袖，个人生活十分清廉俭朴，但是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他，深深陷入别人对他的赞誉和奉承之中而不能自拔。为了讨好斯大林，苏联各级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为其修建豪华别墅，数量达 100 栋之多，且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也纷纷效仿，勃列日涅夫仅在莫斯科郊外就拥有 6 栋别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他苏共高级领导也纷纷效仿修建乡村别墅，中下层干部则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占公共住房。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共贪腐的高峰，他本人更是中饱私囊的代表。他在位期间收受的各种高档礼品不计其数，收藏的豪华轿车有一百多辆，甚至不惜充当腐败分子的代言人，公开宣称“靠工资谁也活不了”。他极其愚蠢地认为抢劫、盗窃公共设施以及干部行贿受贿都是正常的事情。其继任者戈尔巴乔夫更有过之，他利用权力在国内诸多疗养胜地修建新的总书记官邸，并大肆聚敛钱财，仅个人银行账户上就有几百万美金。

苏共高级领导的腐化堕落对全体党员的思想和行为产

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变质的党员干部在腐败案中沆瀣一气，腐败犹如癌细胞一样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滋生扩散。在勃列日涅夫的袒护和纵容下，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在执掌内务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贪污受贿达 654 200 卢布。“鱼子酱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腐败案件接连发生，牵涉范围之广、人员之多令人唏嘘。此外，由于苏联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人民群众很难依靠官方律令和正常的制度化途径解决问题，不得不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寻求各级党政干部的帮助。这为中下层领导干部的寻租、受贿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的观点不无道理，他认为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第二，思想混乱与行为失范相伴。相关档案资料显示，1970 年代以后苏共高层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记录，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修养的薄弱和行为的偏差是苏共从政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理论修养的匮乏使苏共对于社会发展的认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显现。赫鲁晓夫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知之甚浅，在处理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上，缺乏理性思维和深谋远虑。他从唯意识论的角度出发，极端冒进地认为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 年又宣称苏联要在 20 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超出现实的目标，使苏联各地刮起了浮夸风。为了达成冒进计划，一些领导干部急躁短视，常常采用竭泽而渔的非正常手段。赞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为了完成肉类产量翻两番的目标，高价收购私有和外地牲畜，甚至采用屠杀牲畜和种畜等手段，虚报政绩。在急躁冒进的从政环境中，苏联的农业生产大起大落，以至于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出现了粮食危机。勃列日涅夫同赫鲁晓夫一样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脱离实际地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经十分成熟，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苏共理论界停滞不前，国家失去了改革的活力，保守、僵化、贪腐、奢靡享乐之风在党员干部的心中不断滋长，从政环境处于“癌变”的边缘。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片混乱，党的决议频繁改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大行于世，社会主义理想被抛弃，社会中逐渐出现了全盘否定苏共历史的倾向。这严重搅乱了本就污浊的从政环境，把党和国家拖入了危机的边缘。

第三，污浊的党内环境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执政党作为一种特殊组织掌握着国家权力，其成员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能促进或滞缓经济文化的发展。党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和执政党的代言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左右人们的是非标准和社会风气。另外，党员干部的政治、经济活动都在社会中

进行,必然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其思想和行为也会被社会风气所改变。苏共从政环境的恶化是从党员干部思想行为的蜕变开始的。一些党员干部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把捞取官职、攫取更多个人利益视为最终追求,从而形成一些不良思想,诸如官僚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工作拖沓等。在这些观念的作用下,党政干部的工作作风、从政行为变得奢侈腐化、不求实效。

领导干部之中的恶劣风气不仅污染了党内环境,而且对社会环境造成了十分负面的影响,贪污腐败、损公肥私、行贿受贿等不良风气在社会各行各业中蔓延。阿科波夫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相关数据显示,1973—1983年之间,苏联国内的抢劫犯罪数量每年增长200%,入室盗窃案和受贿案件的增长则高达300%^[5]。此外,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报纸、电视、电台等不断宣扬色情、暴力,肆意地批判苏共和社会主义。无序杂乱的社会环境与从政环境相互感染,造成苏联突发性的社会失序与混乱,成为搞垮苏共、搞乱社会、颠覆社会主义的破坏性因素。

三、苏联从政环境污浊的当代启示

反思苏共执政历程,不难看出:从政环境的污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教训是深刻的,值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思。

第一,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必须狠抓党的建设。苏共从政环境的失衡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建设的薄弱。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从政环境主动的营造者,因此,廉洁、清正环境的形成必须从党的建设抓起。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的先进性受到挑战。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通过思想理论建设加强党员干部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除此之外,要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增强党的组织能力,把不符合条件的党员开除出党。列宁曾经严厉指出:“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从党内清除出去。”^[6]只有这样才能建成一支高素质的勤于治国理政的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才能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实现政风和民风的转变。

第二,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必须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僵化的干部任用制度是苏共贪腐、党风败坏的主要原因。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如何选贤任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为民、务实

作风的基础条件。党政机关应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为原则,选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权力始终控制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形成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深化干部人事改革。一方面,规范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程序,让民主的阳光能够真正普照到干部选用的所有环节;另一方面,严格实行相关的追责制度。“用人关乎兴亡”,用人不淑所带来的损失要远比其他失误严重得多。因此,实施干部任用失误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十分必要。这不但能够督促相关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客观、公正地提拔干部,减少用人腐败,而且能够纯洁干部队伍,保障从政环境的健康发展。

第三,以上率下,领导干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苏联自上而下的腐败,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给中共领导层敲响了警钟。如果党员干部能够坚持秉公用权、清廉自守,以自身良好的作风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实质性转变,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从政环境的形成将指日可待。“一德立而百善从之”,正人必先正己。习近平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坚守正道、弘扬正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疾恶如仇,艰苦奋斗、清正廉洁。领导干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掌舵者”和“领航员”,其言行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能够对党内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示范效应能够影响和激励其他人,有助于形成一级看一级、一级带一级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 [1] 慎海雄. 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J]. 瞭望, 2014(27):14-15.
- [2] 叶·利加乔夫. 警示[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89.
- [3] 于洪君. 丰碑与警示——20世纪的社会主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309.
- [4] 列宁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88.
- [5] 李慎明.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323.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49.

(责任编辑:白丽娟)